

从地区性市场走向区域性市场

——基于五大城市群市场分割的测算

刘昊^a 祝志勇^{a, b1}

(西南大学:a. 经济管理学院;

b. 经济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摘要】: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进一步凸显了建立一个国内统一市场的重要性。通过对 2001—2018 年五大城市群内部与城市群之间市场分割水平的测度和比较,发现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水平逐渐下降,不同行政区划所带来的边界效应逐渐减弱,但城市群之间市场分割水平较高,提出我国产品市场一体化正从以省界为界限的地区性市场向以城市群为界限的区域性市场演进。对各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和地区市场规模的提升是各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提升的主要动力,对外开放对市场一体化的助推作用不明显,以上因素对五大城市群市场分割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市场分割 行政区划 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912(2021)01—0124—12

一、引言

建立一个国内统一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重要目标,尤其是在当前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贸易的不断萎缩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激发国内消费潜力和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是持续保障我国经济增长、最大程度降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外部冲击的动力源泉^[1]。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畅通国内大循环,意味着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城市群或都市圈的建设,就是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主要内容,其一体化就是对内高水平的开放。尤其是部分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城市群,其内部市场一体化有助于打破省界屏障,实现产品市场从地区性市场向区域性市场直至全国性市场的演进。然而也有研究指出提出我国各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现象长期存在,区域协同水平较低。因此本文以我国五大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城市群^①为例,通过测算并分析各城市群内部及城市群之间市场分割水平,考察当前我国产品市场一体化的进程,然后进一步分析各城市群内部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的差异,以更好的把握我国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推进路径。

¹**作者简介**:刘昊(1995—),男,江西吉安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市场分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祝志勇(1965—),男,四川蓬安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经济转型。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团队重大项目“我国绿色创新效率的评价及制度优化设计研究”(SWU1709119);西南大学决策咨询项目“‘十四五’期间政府创新补贴绩效的再评估与提升对策研究——基于同群效应视角”(19SWUJCZXA2)。

本文的结构安排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对于市场分割的测度方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梳理总结,提出本文的研究目标;第二部分对我国五大城市群市场分割进行测度,分析其发展趋势和差异,考察当前我国是否实现从地区性市场向区域性市场的跨越;第三部分为对各城市群市场分割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分析各城市群市场分割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差异;第四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市场分割主要是指一国范围内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利益,通过行政管制手段,限制外地资源和企业进入本地市场或限制本地资源流向外地的行为(银温泉,才婉茹;2001)^[2],自Young(2000)^[3]提出当前我国存在市场分割现象以来,国内外学者采用不同方法对市场分割问题进行测度,主要可归纳为三大类,基于地区贸易流量的测算、基于地区产出的测算以及基于地区商品价格波动的测算。其中第三类方法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测度方法,该方法通过比较区域商品价格差异来衡量地区市场分割,根据“一价定律”,如若地区间不存在市场壁垒,商品的自由流动最终会实现商品价格的趋同,因此地区市场价格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区间的市场分割水平。由于价格数据加总程度较低,包含信息更加干净,不再受到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等地区性因素的干扰。Parsley和Wei(2001)根据“冰川成本”模型提出以相对价格方差来反映市场分割程度,这一方法逐渐成为当前测度中国地区市场分割的主流方法^[4]。桂琦寒等(2006)和陆铭等(2009)相继将该方法应用于中国省际市场分割的测度中,均认为我国存在地区市场分割但分割程度有所下降^[5-6]。近年来随着我国各城市商品价格数据的可得性不断提高,也有部分学者将相对价格法应用于我国各城市市场分割的测度中,也得出了相似结论(黄新飞等,2013;吕冰洋、贺颖,2020)^[7-8]。

在对于地区市场分割通过不同方法进行测算以及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后,众多学者也对中国地区市场分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其观点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有学者认为市场分割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权式改革的后果,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财政体制经历了多次改革,这些改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激发地方生产积极性,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等问题(林毅夫、刘志强,2000)^[9]。也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实行市场分割的目的之一在于提高本地区区域分工地位,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赶超(陆铭等,2004)^[10],落后地区为了实现对较发达地区的赶超往往倾向于短期内选择不与发达地区进行分工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提高未来分工收益。此外对外开放也是中国地区市场分割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加深,使得各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能够通过国际市场实现规模经济,从而忽视了国内市场(钟昌标,2002)^[11]。部分学者认为地方市场分割也是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马秀颖、赵儒煜,2008)^[12]。一方面,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地方政府在承担大量行政事务的同时缺乏充足的财政资金支持,因此地方政府倾向于实施市场分割以保障自身经济利益(Qian and Wein gast, 1997、Qian and Roland, 1998;)^[13-14]。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所面临的晋升与绩效考核制度也是其实行市场分割的政治利益激励(周黎安,2004;徐现祥等,2007)^[15-16]。非正式制度也是地区市场分割形成的重要原因,如民族多样性、行政区划、方言多样性等因素都会影响地区市场分割水平(Delhey和Newton, 2005;高翔、龙小宁,2016;丁从明等,2018)^[17-19]。

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市场分割的研究众多,且研究视角多样,研究深度日益凸显,但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对市场分割的测度多集中在省级层面,对于地级市这一层面的市场分割测度较少;其次在对地级市的市场分割测度中,缺乏对城市群这一个经济单元内部市场分割的考察,更缺乏对城市群内部不同行政区划所带来的边界效应影响的分析。随着我国大城市和城市群经济规模与地位不断提升,城市群正成为新的空间经济单元,通过对城市群内部及城市群之间市场分割进行测度和分析,实现国内市场从地区性市场向区域性市场的跨越和打造“国内大循环”是本文的研究目标所在。

三、五大城市群市场分割的测度与趋势分析

(一)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1. 测度方法

论文采用相对价格法对各城市群商品市场的市场分割程度进行测度，主要计算步骤包括：

(1) 对 i 、 j 地区的商品 k 的环比价格之差使用对数差分法进行处理：

$$\begin{aligned} |\Delta Q_{ijt}^k| &= |\ln(P_{it}^k / \ln P_{jt}^k) - \ln(P_{i,t-1}^k / \ln P_{j,t-1}^k)| \\ &= |\ln(P_{it}^k / \ln P_{i,t-1}^k) - \ln(P_{jt}^k / \ln P_{j,t-1}^k)| \end{aligned}$$

(2) 为消除由于商品的异质性所导致的商品价格波动的差异，对 $|\Delta Q_{ijt}^k|$ 去均值 $|\overline{\Delta Q_{ijt}^k}|$ ，得到仅包含市场分割因素

商品价格变动 $q_{ijt}^k = |\Delta Q_{ijt}^k| - |\overline{\Delta Q_{ijt}^k}|$ 。

(3) 计算各类别商品的仅包含市场分割因素的价格变动 q_{ijt}^k 的方差 $\text{VAR}(q_{ijt}^k)$ 。这一方差衡量的是由市场分割所产生的套利空间的大小。

(4) 用该地区与其他城市的价格方差的均值 $\text{VAR}(q_{ijt}^k)$ 作为衡量市场分割程度的指标。为了不使回归系数过小而不便展示，和已有文献一致，所有用价格方差表示的市场分割指数已乘以 100。

2. 数据来源

论文通过上述方法以五大城市群 109 个城市^②的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测算各个城市与城市群内部城市、与相邻城市的市场分割程度。商品类别主要包括 8 大类，分别为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由于 2001 年后统计年鉴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统计种类和统计口径出现了调整，因此本文研究的时间序列为 2001—2018 年，为尽可能获得更多的数据，本文以 2015 年后的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指数作为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指数，各城市的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主要来自各省以及各城市历年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其中长三角城市群的池州市由于数据缺失较为严重予以剔除。

(二) 城市群市场分割程度测度结果

1. 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程度

本文采用相对价格法对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 2001~2018 年产品市场分割水平进行了测度，以城市群内所有城市市场分割指数均值表示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水平，测度结果如图 1 所示。

^②①这些城市分别为：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北京、天津、石家庄、承德、张家口、唐山、秦皇岛、廊坊、保定、沧州、衡水；长三角城市群的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宣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襄阳、宜昌、荆州、荆门、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底、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新余、宜春、萍乡、上饶、抚州、吉安，中原城市群的郑州、开封、洛阳、南阳、安阳、商丘、新乡、平顶山、许昌、焦作、周口、信阳、驻马店、鹤壁、濮阳、漯河、三门峡、长治、晋城、运城、邢台、邯郸、聊城、菏泽、淮北、蚌埠、宿州、阜阳、亳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庆、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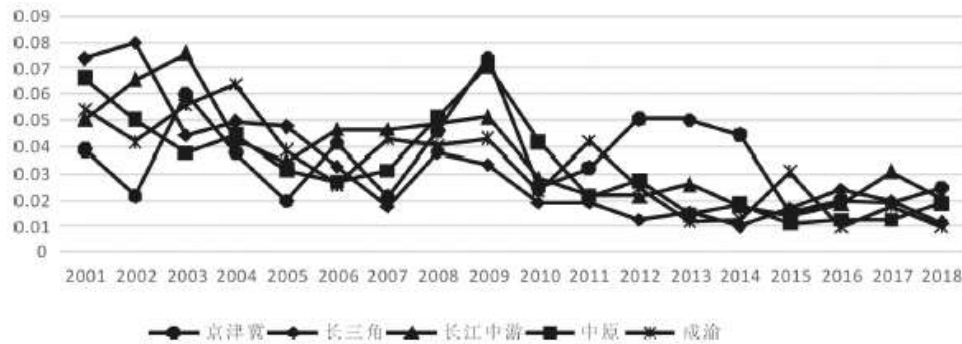


图 1 五大城市群市场分割情况

在样本期内各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均呈波动下降且趋于收敛至较低水平，总体而言各城市群内部市场一体化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产品市场从以省界为界限的地区性市场向城市群范围的区域性市场演进。当然也要看到 2008—2009 年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各城市群市场分割均有所加剧，主要是由于在国际市场萎缩的情况下各地区倾向于实行地方保护政策，优先保障本地区企业的存活与发展。其中市场一体化水平最高的为长三角城市群，作为发展时间最长且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市场一体化起步较早，早在 1997 年便建立了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等组织，有力的助推了城市群内部市场一体化建设(徐现祥, 李郇;2005)^[20]。

各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发展趋势也存在许多差异。其一，京津冀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在 2003 年间市场分割程度出现了较大增长，本文认为其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在 2003 年受非典型性肺炎疫情的影响较大，突发的疫情使得这些地区对外贸易与投资遭受严重挫折，同时为了保障本地区物资保障和企业发展政府倾向于对本地区企业进行政策倾斜，从而加剧地区市场分割。其二，从金融危机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来看，2008—2009 年间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增长幅度最大，可见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越大的地区，实行地方保护的可能性越大，市场分割越明显郭勇(2013)^[21]。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地处沿海地区，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较强，因此这两年间市场分割水平出现了迅速上升;其三，与其他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在 2010—2014 年间市场分割保持在较高水平，本文认为其原因在于在此期间京津冀城市群内部未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资源向北京和天津市两大城市聚集，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市场分割，这一现象直到 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有所缓解。

2. 与省内外城市的市场分割程度

上述分析描述了当前五大城市群内部产品市场的市场分割趋势，本部分进一步考察省界对于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水平的影响。不同行政区划所带来的“边界效应”是城市群市场一体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无论是不同行政区划内部政治锦标赛的差异从而导致地区的不合作(周黎安, 陶婧;2011)^[22]，还是不同行政区划的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非正式制度冲突与不信任(高翔、龙小宁;2016)^[18]都将增加经济交往中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地区市场分割水平。本部分将各城市与城市群内部同省范围内城市(以下简称省内城市)和不同省范围内城市(以下简称省外城市)之间的市场分割水平进行分别测度，考察城市群内部市场一体化进程是否打破了省界限制，实现了从以省界为界限的地区性市场向城市群范围的区域性市场演进。测度结果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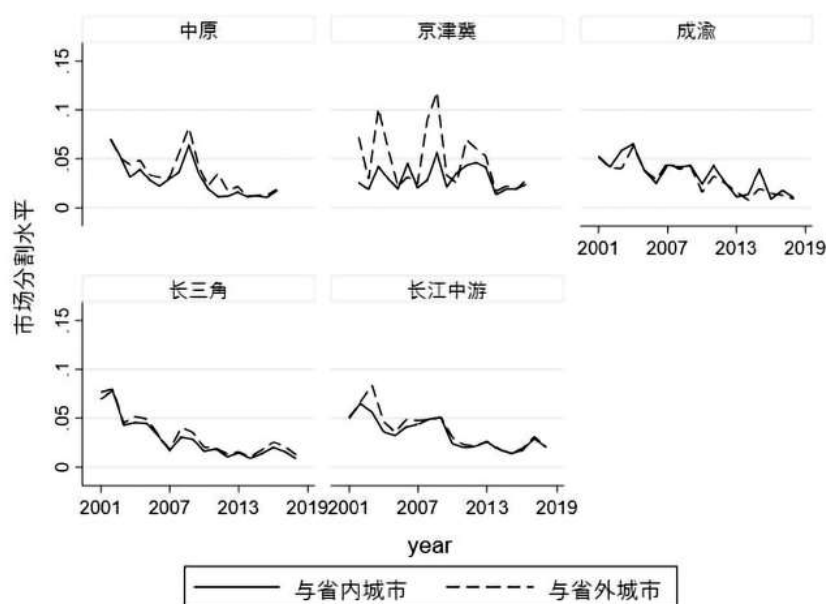


图 2 城市群内部城市与省内外城市市场分割情况对比

从测度结果来看，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外其余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与省外城市的市场分割水平均长期高于与省内城市的市场分割水平。但这一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城市群内部不同行政区划的“边界效应”正在不断减弱，区域性市场正在形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较为特殊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重庆与四川行政区划具有特殊性，重庆市系 1997 年从四川分离作为直辖市，两个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较小，地区之间交流较为频繁，因此行政区划的影响较小；另一方面由于重庆市各区县数据难以获得，因此本文以重庆市作为整体计算其市场分割水平，无法细致考察各城市对重庆市各区县的市场分割水平，因此不可避免的会带来误差；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与省内外城市市场分割水平差距长期低于 0.01，处于较低水平，可见长三角城市群内部行政壁垒较少，各城市实现了协同发展；京津冀城市群内部这一差距在 2001—2014 年间长期处于较高水平，2014 年后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有所缓解，城市群内部城市与省内外城市市场分割水平的差距从 2014 年的 0.0113 下降至 2018 年的 0.0046；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城市与省内外城市市场分割水平差距在样本期内波动较大，从 2001 年的 0.0019 提升至 2003 年的 0.0280，此后又出现下降，至 2013 年《武汉共识》的签署标志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正式启动后趋于稳定，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中原城市群内部城市与省内外城市市场分割水平的差距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尤其是在 2009—2014 年间随着中原城市群规模的扩张，中原城市群成为了涵盖 5 个省份 30 个城市的经济区，但也带来了行政壁垒、协调困难、区域差异大等现象和问题，这一问题直到 2013 年 9 月《共同推进中原城市群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和 2014 年中原城市群列入国家重点培育发展的跨省级行政区的国家级城市群后才得到有效解决，城市群内部市场一体化快速推进。总体来看随着城市群战略的不断深入推进，各城市群内部省界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持续削减但依然存在，如何破除城市群内部不同行政区划所带来的“边界效应”仍是城市群内部市场一体化的重要着力点。

3. 各城市群之间市场分割程度

本部分将进一步对各城市群之间市场分割水平进行测度(见表 1)，结合前文中对各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水平的测度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更好的把握当前我国国内市场分割的发展趋势。

表 1 各城市群之间市场分割水平 (单位:%)

	2001	2003	2008	2012	2015	2018
--	------	------	------	------	------	------

京津冀-长三角	0.0669	0.0711	0.0918	0.0805	0.0211	0.0390
京津冀-长江中游	0.0503	0.0980	0.0959	0.0720	0.0168	0.0322
京津冀-中原	0.0613	0.0585	0.0989	0.0822	0.0158	0.0290
京津冀-成渝	0.0787	0.0615	0.0645	0.1129	0.0252	0.0324
长三角-长江中游	0.0737	0.0681	0.0622	0.0252	0.0197	0.0231
长三角-中原	0.0772	0.0534	0.0511	0.0229	0.0158	0.0202
长三角-成渝	0.1301	0.0682	0.0507	0.0301	0.0298	0.0152
长江中游-中原	0.0646	0.0638	0.0579	0.0266	0.0145	0.0207
长江中游-成渝	0.0908	0.0766	0.0544	0.0378	0.0250	0.0170
中原-成渝	0.0857	0.0592	0.0543	0.0330	0.0239	0.0171

结合表 1 与图 1 来看, 样本期内各城市群之间与城市群内部市场一体化程度均有所提高, 且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 但从市场分割指数大小来看, 各城市群市场分割程度普遍高于城市群内部, 可见各城市群内部市场整合进程较快, 而城市群之间市场一体化水平仍有待提升, 这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我国产品市场正在迈向城市群范围内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发展阶段。

从各城市群之间市场分割的发展趋势来看, 地理距离所带来的贸易成本的高低是影响前期各地区市场分割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样本期的前期相较于不相邻的城市群, 各城市群与相邻城市群的市场分割指数普遍较低, 而后期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这一因素的影响有所减弱, 各城市群之间市场分割值的差距逐渐缩小; 此外, 长江经济带范围内的三大城市群(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之间市场分割水平下降速度较快, 到 2018 年分别下降了 68.7%, 88.3%和 81.3%, 尤其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场整合进程较快, 到 2018 年市场分割值分别为 0.0152 和 0.0170, 是各城市群之间市场分割的最低值; 最后, 京津冀城市群与长江经济带内各城市群市场整合程度较为缓慢, 2018 年京津冀与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市场分割值在各城市群之间市场分割值中位列前三。从地理位置来看, 京津冀城市群位于中国北方, 与长江经济带距离较远, 交通成本高, 南北方文化差异明显, 如何推进京津冀与长江经济带内三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 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长江经济带两大国家发展战略协调推进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城市群市场分割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从前文分析可知, 五大城市群在 2001—2018 年市场一体化水平均有了较大提升, 但其发展趋势也存在较大差异,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哪些因素影响了各城市群内部市场一体化? 这些影响因素对不同城市群存在哪些差异? 结合相关文献, 本文接下来将对此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

(一)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文以五大城市群共 109 个城市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其市场分割的影响因素, 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seg_{it} = \alpha_1 gov_{it} + \alpha_2 trade_{it} + \alpha_3 scale_{it} + \alpha_4 trans_{it} + \alpha_5 soe_{it} + \del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在模型 (1) 中, seg 表示各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指数, gov 、 $trade$ 、 $scale$ 、 $trans$ 、 soe 分别表示影响市场分割的政府干预、对外贸易、市场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国有化程度, δ 表示地区固定效应, ε 代表随机误差项, 下标 i 为地区, t 为年份。

根据相关研究结果与理论，本文选取如下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

1. 政府干预(gov)

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是地区市场分割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越多，采取非经济手段加剧分割的可能性越大；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认为随着现代政府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对于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出越大，表明政府更倾向于破除地方分割障碍，促进地区间交流融合(林毅夫、刘培林，2010)^[23]，此外，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交流合作的加深也将弱化各地区实行市场分割的动力。因此，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对市场分割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本文以各地区财政支出占地区 GDP 比重作为衡量地区政府干预程度的指标。

2. 对外贸易(trade)

对外贸易对市场分割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部分学者认为对外贸易的不断拓展会使得各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倾向于在国内市场实行市场分割而通过国际市场实现规模经济，加剧地区市场分割状况。^[6]但也有观点认为对外贸易的扩张有助于实现国内地区间贸易的增长，从而消除市场分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提出要使得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促进。本文采用各地区进出口贸易额与地区 GDP 之比对其进行度量。

3. 市场规模(scale)

地区市场规模的扩大一方面意味着地区市场需求的提升，当本地区企业生产规模小于市场需求时，市场需求的提升将使得地区间贸易的增长，从而消除市场分割；另一方面，市场规模的提升也意味着地区更易依靠本地区市场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对其他地区市场的依赖程度，使得本地区实行市场分割有了更大可能。本文借鉴刘瑞明(2012)^[24]的做法采用人口密度与人均 GDP 的乘积即各地区每平方公里土地的经济产出衡量地区市场规模。

4. 交通基础设施(trans)

地区间贸易成本较高是导致地区间贸易下降和市场分割程度提高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制约国内统一市场建设的重要因素(任志成等，2014)^[25]。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降低地区贸易成本，推进地区间贸易的扩张，进而消除地区间市场分割。鉴于公路是相邻地区间国内货物贸易的重要途径，本文用公路网密度(公路里程与地区面积之比)考察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市场分割的影响。

5. 国有化程度(soe)

地区国有企业不仅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地方政府维护本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承担了一系列如吸纳社会就业，建设重大工程等政策性负担。由此也带来地区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利益捆绑，地方政府为保障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实行市场分割方面存在较强的动力和激励。因此，地区国有化程度的提升将加剧地区间市场分割。本文参照陈刚、李树(2013)^[26]的做法以国有单位在岗职工人数与地区就业人数之比来衡量地区国有化程度的高低。

各变量数据主要来自各省市 2000—2019 年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表 2 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	-----	----	-----	-----	-----

Seg (%)	1962	0.034	0.027	0.005	0.284
gov	1962	0.135	0.057	0.021	0.675
trade	1962	0.188	0.309	0	2.882
scale	1962	0.233	0.385	0.003	5.686
trans	1962	1.090	0.504	0.119	2.630
soe	1962	0.076	0.046	0.012	0.435

(二) 实证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以控制了地区效应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五大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的影响因素进行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各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水平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发展思路的转变，外加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助推了地区间贸易的增长，此外京津冀城市群庞大的市场规模所衍生出的庞大需求也促进了地区间贸易的增长，从而降低了地区间市场分割，交通基础设施对市场分割主要起促进作用，与预期不符，其原因可能在于相对于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京津冀城市群公路网密度仍显得不足，2018 年整体公路网密度仅为 1.013km/km²，尤其是承德市与张家口市公路网密度较低，地区间贸易成本仍较高。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城市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同样有助于消除地区市场分割，且国际贸易的增长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推动了地区间贸易的发展，有助于消除市场分割。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场分割水平的变量主要为政府干预、对外贸易与市场规模，且对市场分割均为抑制作用，从影响幅度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场分割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间合作的加强以及政府通过干预经济来主动消除市场分割。中原城市群作为涉及省份最多的城市群，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政府干预，城市群内部政府之间的合作及城市间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化使得地方政府倾向于消除市场分割，但与此同时，中原城市群内部各城市较高的国有化程度是消除地区市场分割的重要阻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分割水平的下降既有政府干预的影响，也是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反馈，由于地处西部地区，地形崎岖，交通不便，地区贸易成本较高一直是抑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区间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因此交通设施的改善有助于地区市场分割水平的下降。

2. 动态面板估计结果

由于市场分割行为存在时间惯性产生滞后影响，如政府政策、补助的长期性影响等。且市场分割与各影响因素之间也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如市场分割水平的提高也会迫使地区通过对外贸易实现规模经济，这些都将使得模型(1)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解决此问题，本文采用矩估计方法，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对各城市群进行系统矩估计(SYS—GMM)，将模型(1)调整为：

$$seg_{it} = \alpha_0 seg_{it-k} + \alpha_1 gov_{it} + \alpha_2 trade_{it} + \alpha_3 scale_{it} + \alpha_4 trans_{it} + \alpha_5 soe_{it} + \del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模型(2)为本文的动态回归模型，在静态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被解释变量，k 为滞后期数。由于京津冀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据属于长面板数据，而系统矩估计适用于短面板，对于长面板数据而言，由于动态面板偏差较小，可以通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解决。为便于数据处理，本文参照李雪松、孙博文(2015)^[27]的做法，根据产品市场市场分割 2001—2018 年的变化趋势，以 2003 年、2008 年、2010 年、2015 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五个时间阶段，对每个时间段各变量进

行平均化处理，从而构建京津冀城市群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短面板数据库，以此进行系统矩估计。

分别对各城市群数据进行了矩估计，选取被解释变量的最多二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通过自相关检验表明模型均只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符合矩估计成立的前提，同时 sargan 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说明工具变量选取是有效的。

与基准回归相比，在动态回归中京津冀、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政府干预对市场分割的影响仍较为显著，从影响幅度来看，京津冀城市群政府干预对本地区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其次是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最弱。各地区政府机构改革进程与发展思路转变过程的差异是导致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尤其是成渝两大城市政府之间多年来的相互竞争以及由此带来的背向发展对经济圈内部产品市场一体化的阻碍作用仍有待消除。长三角城市群对外贸易的扩张推动了城市群内部市场一体化，京津冀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对外贸易对市场分割的影响的显著性水平出现了下降，本文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长三角城市群对外贸易规模较大，2018 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10.43 万亿元，外贸依存度在 58% 以上，庞大的外贸规模带来了地区市场需求的提升，从而促进了地区间贸易的增长，而其余地区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市场需求扩张有限，对地区间贸易的促进作用较小，这也可以看出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作用仍有待提高。除长三角城市群外，其余城市群内部市场规模的扩大都有助于扩大地区间贸易规模，从而消除市场分割，尤其是中原城市群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规模这一变量的显著性提升，而长三角城市群市场规模对市场分割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其原因主要在于长三角城市群企业众多，据统计 2019 年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11.7 万家以上，本地区企业生产规模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从而使得长三角市场规模的扩大对地区间贸易影响较小，对地区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不显著。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仅在长三角城市群表现较为显著，在其他城市群则表现为抑制作用但不显著，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最为发达的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各交通方式之间互联互通水平较高，有力的推动了地区贸易成本的降低，进而推进了地区市场一体化进程，而其他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仍有待提高，公路网密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对地区间贸易成本下降的作用有限。

3. 稳健性检验

(1) 考虑行政级别和极端值的影响

由于不同城市行政级别的差异会影响地区间的可比性，因此本文将剔除各城市群中的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的数据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即剔除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北京市和天津市，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和宁波市，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武汉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庆市、成都市，此外，为消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将对各变量数据进行 99% 缩尾处理，除京津冀城市群对外贸易变量的显著性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北京市和天津市进出口贸易额长期占京津冀城市群进出口贸易额的 90% 以上，在剔除了北京市和天津市后，其余城市对外贸易规模较小，对地区间贸易的促进作用有限；此外长三角城市群的国有化程度、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市场规模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交通基础设施这些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均有所上升。总体来看，各变量的系数符号与基准回归相比均未发生明显变化，说明模型较为稳健性。

(2) 差分矩估计

为检验动态面板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差分矩估计 (DIFF-GMM) 对各城市群数据进行重新估计，从 AR(2) 检验和 sargan 检验结果来看，符合差分矩估计成立的前提，且不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说明差分矩估计的结果是有效的。与动态矩估计 (SYS-GMM) 回归结果相比，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有化程度对市场分割影响系数的显著性有较大提升外，其余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未发生较明显的变化，说明模型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论文通过相对价格法以五大城市群 109 个城市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对各城市群产品市场分割水平进行了测算，以此对五大城市群内部及各城市群之间市场分割的发展过程和趋势进行了分析，并对各城市群市场分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

1. 样本期内五大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水平主要呈下降趋势，尤其是 2014 年以来各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指数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城市群内部市场整合进程较快。对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与省内外城市之间市场分割的测度结果表明城市群内部不同行政区划所带来的“边界效应”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有所减弱但依然存在。

2. 相较于各城市群内部，城市群之间市场分割水平普遍较高，尤其是京津冀城市群与长江经济带内三大城市群市场分割水平较高。城市群内部市场一体化水平较高与城市群之间市场整合进程相对缓慢的这一现状表明我国产品市场正从以省内整合和省际分割为特征的地区性市场向以城市群内部整合和城市群之间分割为特征的区域性市场演进。

3. 各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和地区市场规模的提升是京津冀、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一体化提升的主要动力，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迅速推进主要来自于对外贸易的扩张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中原城市群市场分割的下降主要受地区市场规模扩张的推动。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论文主要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鉴于城市群内部行政壁垒对市场一体化的阻碍作用仍存，以及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入政府干预对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应继续加强交流合作，转变对市场的干预方式。各城市群内部应积极探索和完善城市群间定期沟通协商和对接机制，积极推进与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尤其是不同省份城市的跨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议与完善，加强各城市群中长期规划的对接，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在城市群内部进行统一布局、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促进各城市之间的功能互补；政府各部门也要转变职能，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优化地区营商环境，对不同类型企业要一视同仁，要强化大局意识、整体意识，推进各城市群内部产品市场一体化。

第二，城市群之间市场分割水平较高是当前我国市场一体化所面临的新问题。当前我国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的同质化竞争与资源错配问题仍长期存在，各城市群发展战略应充分考虑与其他城市群之间的对接，加强城市群之间政策协同，促进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个城市群之间的合作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中央政府应建立对城市群合作互补发展的奖惩机制，打破地域藩篱，加强对地区对中央政府政策执行力度与深度的监管，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调动地方政府合作的积极性。

第三，国际贸易对地区间贸易的助推作用不显，以及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对市场一体化展现出的强大推动力，表明我国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全球市场需求萎靡和国际贸易规模下降也倒逼着国内市场加强市场一体化建设，以本国市场实现规模经济，各城市群应发挥本地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深入挖掘和激发国内市场供给与需求潜力，着力促进形成强大统一的国内市场；同时要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强调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不意味着关门封闭，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各城市群要更好的发挥国际贸易对地区间贸易的促进作用，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吸收、借鉴国外产品技术和优势，打造本地区优势产业，发挥优势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进而驱动地区市场一体化。

参考文献:

- [1]行伟波. 应对危机需要整合国内市场[N]. 社会科学报, 2020-05-28(002).
- [2]银温泉, 才婉茹. 我国地方市场分割的成因和治理[J]. 经济研究, 2001, (06): 3-12, 95.
- [3]YOUNG A. The Razor' 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4): 1091-1135.
- [4]Parsley D C, Shang-Jin Wei. Explaining the Border Effect: The Role of Exchange Rate Variability, Shipping Cost and Geography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55(1): 87-105.
- [5]桂琦寒, 陈敏, 陆铭, 陈钊. 中国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分割还是整合: 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分析[J]. 世界经济, 2006, (02): 20-30.
- [6]陆铭, 陈钊. 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J]. 经济研究, 2009, 44(03): 42-52.
- [7]黄新飞, 舒元, 郑华懋. 中国城市边界效应下降了吗?——基于一价定律的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13, 12(04): 1369-1386.
- [8]吕冰洋, 贺颖. 迈向统一市场: 基于城市数据对中国商品市场分割的测算与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0, (04): 13-25.
- [9]林毅夫, 刘志强.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04): 5-17.
- [10]陆铭, 陈钊, 严冀. 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J]. 经济研究, 2004, (1): 54-63.
- [11]钟昌标. 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与国际竞争力[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01): 94-100, 207.
- [12]马秀颖, 赵儒煜. 中国地方市场分割成因刍议[J]. 当代经济研究, 2008, (04): 30-33.
- [13]Qian Y Y, B R. Weingast.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96: 584-595.
- [14]Qian Y, Rolan G.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2: 202-206.
- [15]周黎安.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 经济研究, 2004(06): 33-40.
- [16]徐现祥, 李郁, 王美今. 区域一体化、经济增长与政治晋升[J]. 经济学(季刊), 2007, (06): 1075-1096.
- [17]Delhey J, Newton K. Predicting Cross-National Levels of Social Trust: Global Pattern or Nordic Exceptionalism? [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5, 21(4): 769-71.

-
- [18]高翔,龙小宁.省级行政区划造成的文化分割会影响区域经济吗?[J].经济学(季刊),2016,15(02):647-674.
- [19]丁从明,吉振霖,雷雨,梁甄桥.方言多样性与市场一体化:基于城市圈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8,53(11):148-164.
- [20]徐现祥,李郁.市场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发展[J].经济研究,2005,(12):57-67.
- [21]郭勇.国际金融危机、区域市场分割与工业结构升级——基于1985—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3(01):19-31.
- [22]周黎安,陶婧.官员晋升竞争与边界效应:以省区交界地带的经济发展为例[J].金融研究,2011,(03):15-26.
- [23]林毅夫,刘培林.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考察[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C2010015,2010.
- [24]刘瑞明.国有企业、隐性补贴与市场分割:理论与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2,(4):21-32.
- [25]任志成,张二震,吕凯波.贸易开放、财政分权与国内市场分割[J].经济学动态,2014,(12):44-52.
- [26]陈刚,李树.司法独立与市场分割——以法官异地交流为实验的研究[J].经济研究,2013,48(09):30-42,70.
- [27]李雪松,孙博文.密度、距离、分割与区域市场一体化——来自长江经济带的实证[J].宏观经济研究,2015,(06):117-128.